

第一章 西方文化的初传

第一节 寻找黄金与香料

1. 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进

中世纪末期(14世纪),世界历史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从此以后,西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不久它便摆脱了相对落后的局面,以其发自内心的资本主义力量战胜封建主义,还通过开辟新航路和殖民活动建立起世界性的紧密联系,冲击了各大洲的文明。

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大西洋沿岸各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冒险和殖民远征。这场大航海拉开了世界历史巨大转折的序幕。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西欧海外扩张的急先锋,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君主、贵族和商人亟图向外寻求土地和财富;而且更因为它们兴起较晚,地中海贸易和北海贸易已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等所垄断,只好另找出路。葡萄牙的航海活动最初是由“航海王”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组织的,采取沿非洲西岸南下的路线。他们先到达非洲刚果,1487年迪亚士(B. Diaz, 1450—1500)到达非洲最南端的“暴风之角”(后改名为好望角),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9—1524)继承迪亚士的事业,1498年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

库特城。在这里，他们以贱价弄到大批香料^①和宝石等珍贵品回国后以60倍的利润出售，这大大刺激了葡萄牙人的发财欲。

西班牙与葡萄牙竞争，选择了一条向西的航线。1492年哥伦布(C. Columbus, 1446?—1506)发现美洲。1522年麦哲伦(F. Magellan, 1480?—1521)绕地球一周成功，开辟了环绕世界的航路。葡、西两国为避免发生利益冲突，1494年两国缔结《托尔德西雅斯条约》。双方誓言要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宣扬基督教，1529年又在萨拉哥撒签订条约，规定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其东是西班牙活动范围的西界，其西是葡萄牙活动范围的东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瓜分世界。

葡萄牙向东方扩张的方法是首先在侵占的土地上建立许多据点，然后由点到面伸展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西海岸的果阿(1510年占领)为葡萄牙在东方活动的中心。在占领果阿的次年(1511)攻占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接着又占领了巽他群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1516年葡萄牙人从马六甲来到广东、浙江。1553年侵占澳门，把里斯本、果阿和澳门设定为“金三角”。

2. 日本列岛的发现

“日本岛是东洋的一个海岛，位于大陆或蛮子(Manji)海岸相距大约2400公里的海上。

这个岛的面积很大，居民的面目清秀，体格健康，态度文明……根据曾经到过这里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国家的王宫富丽堂皇，蔚为奇观。王宫的整个屋顶用金色的铁皮覆盖着……宫殿的天花板也是同样的贵重金属做成的；许多房间内，有很厚的纯金小桌，窗户也用黄金装饰。这种宫殿富丽的程度，实在难以用语言表

^①指胡椒、丁香、豆蔻、肉桂等，产地集中在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香料对肉的保存和调味是不可少的，欧洲人必须从东方输入。

达。^①这是 13 世纪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日本的记载。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传说东方有个金银宝岛，马可波罗关于日本的记载虽然和宝岛的传说联系起来，但其后 250 年之间没有一个欧洲人的足迹踏进黄金岛日本，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日本像梦幻的仙境一般浮于遥远的东海之中。由于日本列岛的存在没有被确认，其位置也不能正确判明。在世界地图和地球仪上，日本只被当作美洲加利福尼亚近海的一个大岛，或者是阿留申群岛正南面的小群岛，或者是夏威夷附近群岛。当初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时，其目的是想打开由马可波罗介绍给欧洲的日本岛这个黄金宝库，直至他发现西印度群岛之一时，还认为一定是马可波罗所介绍的日本岛，后来才弄清楚美洲与亚洲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此后，他为寻找日本岛而继续探险航行。

由于葡萄牙人东进，并进一步北上，最后到达中国宁波。在马六甲和暹罗，葡萄牙人开始和南航的琉球人接触，才听到有关日本人的消息。16 世纪中叶 欧洲人已迫近日本列岛 它的发现只是时间问题了。

天文年间(1532—1554) 日本终于被欧洲人发现。根据摩鹿加群岛的司令官、殖民史家安东尼奥·伽尔凡(Antonio Galvano, 1503—1557)的《世界探险史》，1542 年 天文十一年 欧洲人发现了日本：

“1542 年费赖泰斯(Diego de Freitas)当船长住在暹罗的多多拉市时 有三个葡萄牙人乘戎克船(中国式帆船) 逃亡中国。他们是安东尼·特·摩托(Antony de Moto)、弗兰西斯·齐莫洛 Francis Zimoro 和安东尼奥·彼罗泰(Antonio Perota)。他们在暴风雨中开船 取纬度 30 余度 目标宁波。数天后 在东方 32 度的方位发现

《马可波罗游记》第 199 页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岛屿 把它称为日本 即马可波罗所谓的日本。这里埋藏着丰富的金银和其他财宝。^①

根据自称四次来日、与种子岛主会面的平托 **Fernao Mendes Pinto, 1509—1583** 的《周游故事》发现者是平托和其他二名伙伴 时间为 1543—1544 年。其他如乔安·罗德里格兹 **João Rodriguez, 1558—1633** 的《日本教会史》和提哥·特·科托 **Diego de Couto, 1542—1616** 的《亚洲志》里发现日本的年代都为 1542 年。独有萨摩的禅僧南浦文之的《铁炮记》记明为 1543 年 8 月 25 日。欧洲人的记载都是十多年或几十年以后根据间接的传闻，不是发现日本的当事人。而《铁炮记》是事后 63 年的 1606 年（庆长十一年），种子岛领主种子岛久时撰写的，连葡萄牙船开来的年月日都记清楚，一定是根据了种子岛家的正确史料而且《铁炮记》里所记的葡人姓名和伽尔凡、平托等人书中的相同。据近人考证，日本列岛发现的年代应归结为《铁炮记》所述的 1543 年。^②

3. 步枪的传入

1543 年（天文十二年）8 月 25 日刮了一昼夜的台风过去了，萨南种子岛属鹿儿岛县西村小浦不知从哪里漂来一只大船。这船好似中国帆船 载有 100 多人。这些人相貌不同 言语不通 西村小浦立即传遍了这件怪事。西村的村主织部丞闻讯赶到现场，与船客中的中国儒生五峰相见，在沙滩上以杖进行笔谈。其后织部丞便向种子岛领主种子岛时尧报告，时尧派来数十条小船，将大船拖到赤尾木。

当时一位精通汉语的住乘院僧侣忠首座巧遇五峰，两人笔谈，十分契合。忠首座从五峰口中知道，船上“西南蛮种”中有两个首

赫尔特列斯著、北村勇译《中世近世日欧交涉史》上册第 26 页，现代思潮社，1981。

岩生成一《锁国》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第 12 卷第 13 页。

领,一个叫牟良叔舍,另一个叫喜利志多佗孟太。他们手中老是拿着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长二三尺,内部空心,外表笔直,显得很沉重。它的内部经常通着,底部需要密塞。旁有一孔,系通火的路。它的形状无物可比。使用方法是,将妙药放入其中,添以小铅弹,先在山边设置一小白点,然后将它拿起,摆正姿势瞄准,从一孔放火,立刻打中。发射时发出电光,声音如雷,闻者掩耳……银山可以破碎,铁壁可以打通^①。这就是当时日本人所见到的“铁炮”(步枪)^②。

“铁炮”的名称是中国人取的还是种子岛人取的不清楚,不过在此前的270年即文永十一年(1274)蒙古侵略日本时就知道它了。因为在著名的《蒙古袭来画词》中画着元军使用的所谓“铁炮”和弹丸。铁炮的前身是“震天雷”(一种火炮)金代用作攻城,后来元军加以改良使用于野战。元末明初震天雷发展成金属制的火枪(小铜枪)并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后来发展为近代的步枪。铜制火枪于1510年(永正七年)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堺市并进行生产,使用于实战。此事种子岛人当然不知道,所以第一次看到西南蛮人带来的步枪便觉得十分惊奇了。^③

据研究,所谓西南蛮种就是葡萄牙人,他们的首领一名叫法兰西斯哥(牟良叔舍)·齐摩特,另一名叫克利斯朵夫·达·摩泰(喜利志多佗孟太),中国儒生五峰就是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的王直,后来成为倭寇的巨魁。

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一事看来是偶然的,实际却是必然发生的。如前所述,《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夸赞的东方黄金成为西班牙

^① 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第12卷第18—19页。

关于步枪的传入,南浦文之的《铁炮记》这样记载:“船客百余人,其貌无类,语言不通,见者皆怪之。内有两人手执‘铁炮’,试之,果然异于凡响。该岛领主时尧,遂不惜重金,求为家珍。”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149页,第一学习社,1980。

^③ 中央公论社《日本的历史》第12卷第22—24页。

人、葡萄牙人远洋探险 实现黄金梦的动力 即使葡人不漂流到种子岛，葡萄牙或西班牙殖民势力总有一天会达到日本。实际上 1540 年（天文九年）前后葡萄牙人已经到达中国浙江 在宁波附近的双屿港进行秘密贸易了。因此 许多人搭乘葡萄牙的商船往来于东中国海，1543 年漂到种子岛的大帆船就是其中之一。

葡萄牙人漂到种子岛的意义 不只是传入欧洲的步枪 还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过去日本人所认识的世界只是从中国大陆到印度的地区 现在知道了还存在着遥远的欧洲世界。从此以后 西方文化随着天主教传入日本 使日本人的思想文化发生莫大变化 其意义重大。而且对只是为获得香料和黄金而东进的葡萄牙人来说，不单是经济活动，还增加了基督教团的活动，使其复杂化多样化。

第二节 天主教的传入

1. 耶稣会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①

“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②

西班牙贵族伊格纳蒂·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受这两句圣经的启示，1534 年与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 1506—1552）等七人在巴黎郊外蒙马特尔山上成立耶稣会。1534 年开始活动，1540 年由罗马教皇批准。

耶稣会总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一切权力集中在总长手中。总长之下设有六人组成的咨议会。耶稣会在世界各地设立许多“管区”这些管区不只包括一国 而是包括数国 管区长领导活动。耶稣会士和一般修道士不同 不住在寂静的修道院里。他们为

^① 《新旧约全书·马可福音》第 16 章第 15 节。

《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16 章第 26 节。

传播天主教，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统治集团。首先争取上层人士信教，然后由上而下普及到民间。为保障传教的物质基础，后来把教会的物质繁荣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由于把贸易利润作为传教经费，耶稣会士往往成了派遣国商人的先遣队。如 1549 年 11 月 5 日沙勿略在鹿儿岛发给印度果阿的一位神父的信中说：“我把同堺通商时特别重要的商品表一同寄上，承办神父出航的人，带来表中所列商品 将获得巨量金银。”^①

的确，天主教在欧洲是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封建势力，与一切进步力量和先进思想作顽强斗争的，有其反动性。这是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进步思潮相较而言，对于既未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又未进行过宗教改革，连人文主义也不知为何物的、封建落后的日本来说，不仅谈不上耶稣会在日本的反动性，它所带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博爱平等思想还给日本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而到日本传道的耶稣会士并非是“狂热的、诡计多端的、具有阴险应变技巧”^②，其中不少是开明之士。如三次来日领导传教的东印度巡察师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具有作为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一面”^③ 他毕业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当时欧洲大学的中心已经移到帕多瓦，伽利略也在这里任数学教授，造就了一批文艺复兴思想家。又如耶稣会士阿尔梅达 (Luis de Almeida, ? —1583) 抛弃外科医生的职业，从里斯本到日本丰后府内，捐献私财开设医院，为缺医少药的下层民众解除病痛。

耶稣会给日本民众带来了新的希望，给日本社会送来了新的思想。耶稣会对社会的作用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发生变化，不能机械地以欧洲历史来指摘耶稣会在日本的反动性。

① 吉川弘文馆编《史料日本史》近世篇第 25 页。

② 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中译本第 4 卷上册。

③ 山本新等编《未来属于中国 —— 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译本第 183 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出版。

2. 沙勿略来日传教

方济各·沙勿略出身于西班牙北部拿瓦拉王国的一个封建领主家庭。1524年西班牙与法国之间发生纷争，因拿瓦拉王国站在法国一边，最后被西班牙灭亡。1534年沙勿略和罗耀拉一起创建耶稣会。因他们是被征服的异族，对西班牙国家冷漠，故耶稣会没有成为西班牙殖民势力的先遣队，却从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ão III, 1503—1557）接受印度传教的任务。

沙勿略视察印度结束后，从马六甲到摩鹿加群岛传教。1547年回马六甲时，遇见日本来的萨摩武士弥次郎（因杀人罪逃到马六甲）闻得日本传教极有希望，便将他送到印度果阿受宗教教育。弥次郎最后受洗礼，改名为保罗，成为日本最早的基督徒。

1549年（天文十八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沙勿略、托尔勒斯（Cosme de Torres, 1497—1570）、费尔南迪斯（João Fernandes, 1525—1567）、弥次郎及其弟约翰、仆人安东尼奥一行六人乘中国帆船抵达鹿儿岛，住在弥次郎家里。不久会见领主岛津贵久，准许传教。贵久是为贸易利用传教，而沙勿略则为传教利用贸易，因此，从基督教传入那天起就埋下了锁国的祸根。

沙勿略在岛津家的菩提寺——福昌寺召集群众开始传道。起初人们认为是天竺传来的佛教中之一派，静心听讲，获得百余名信徒。后来逐渐明白是基督教，且排斥佛教，这引起佛教徒强烈反对，贵久也终于禁止传教。沙勿略在鹿儿岛传教时间前后不满一年。

1550年（天文十九年）葡萄牙船进入平户港，船长为船员的信仰招请沙勿略。于是沙勿略便将后事托给弥次郎，带领托尔勒斯和费尔南迪斯来到平户。原来沙勿略雄心勃勃，打算会见日本的统治者，得到许可后在全日本传教。因此他让托尔勒斯留在平户，自己带着随员到山口、堺，目标是京都。在山口，大内氏不太欢迎他，便离开山口由海路到堺，由堺富豪日比屋珪引线，来到京都。但应仁之乱以后京都屡遭战祸，而且天皇毫无势力，传教无望。沙勿略

在京都停留十天就离开，从堺回到平户。1551年(天文二十年)春又到山口。

山口是掌握中国勘合贸易的大内义隆的城下町(军镇)人口四万，相当繁荣。沙勿略第二次谒见大内义隆，递交果阿的印度总督和主教的信，献上钟表、步枪、缎子、眼镜、玻璃器皿等礼物，得到了传教许可(现在山口建有传教纪念碑)。两个月时间内受洗的信徒约500人。后来沙勿略到丰后府内，得到领主大友义镇(宗麟)的保护，着手传教。不久，府内成为日本天主教传播的一大中心。

沙勿略在日本只有两年三个月，1551年11月乘葡萄牙船返回印度果阿。沙勿略回果阿是为到中国作传教准备。1552年他从果阿到广东上川岛(今属台山县)始终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同年病死于岛上。

3. 教会的繁荣

继沙勿略之后，许多传教士来日传教。1552年(天文二十一年)伽果(B. Gago, 1515—1583)、阿尔加赛瓦(P. Alcaceva, 1523—1585)等来日，接着1556年(弘治二年)双纳斯(B. Nunes)、维列拉(G. Vilela)、弗洛伊斯(Í. Frois, 1512—1597)等来日。他们先在九州传教，受到山口的大内义隆、府内大分市的大友宗麟的保护，传教相当成功。

耶稣会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先使当地大名、领主受洗，然后通过大名的权力一举把领内的人民收为信徒。肥前国(长崎县)大村的领主大村纯忠于1563年(永禄六年)最先受洗，成为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大名”。接着受洗的大名有丰后国大分县的大友宗麟、肥前国的有马义贞(大村纯忠之兄)和有马晴信(义贞之子)、筑前国福冈县的黑田孝高。这些天主教大名为了取得步枪、火药、皮制品和铁，欢迎耶稣会来传教，所以传教事业发展很快，十年内遍及北九州一带，府内成为传教中心。当时天主教被称为“切支丹宗”、“天竺”或“南蛮宗”。

1570年元龟元年大村纯忠把领内的长崎献给教会 作为葡萄牙的贸易港开放,1580年天正八年又将长崎附近的茂木献给教会,成为教会的领地。后来有马晴信也将浦上献给教会。

1559年永禄二年雉列拉到京畿地方开教 得到将军足利义辉的保护 以京都为中心向摄津、河内、和泉、大和方面发展 堺市大名小西行长、摄津国大名高山右近等信教。1565年起弗洛伊斯参加活动,传教事业更加兴盛起来。1568年弗洛伊斯谒见新兴武将织田信长 取得他的信任。在织田的保护下 京都教会大为兴隆,建立教堂(俗称南蛮寺)。后来安土城也建立教堂。至1580年京都地区信徒数字超过九州地区。

1579年(天正七年)耶稣会派遣巡察师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来日本领导传教事业。1581年他进京谒见织田信长,受到厚遇。范礼安确立了传教制度,把日本分为都、丰后、下(长崎)三个教区,包括京都、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共一都六道。还设立教育机关,培养日本传教士。在安土、有马设立神学校 在府内设立神学院 在白杵设立修道院,宗教教育机关完备了。

至1583年全国各地有教堂近200所 分驻所20多个。^①信徒也逐年增加,1570年为二三万人,1580年10万人,1582年15万人。1590年20至24万人,1600年达30万人,1610年减至22万人。^②信徒不单是大名 还包括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特别九州农村还以教会为中心成立农民信徒的“讲”组织(如慈悲组、圣马利亚组等)朝弥撒晚祷告 吸引农民参加。对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教会所行的医疗事业和救灾活动无疑是“及时雨”收到很大的效果 吸引了广大农民的归依。

冈田章雄《天主教风俗与南蛮文化》第140页 思文阁1983。

松田毅一《范礼安与天主教宗门》第180页 朝文社,1992。

4. 天主教在日本迅速传播的原因

天主教很快被日本人接受，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战国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如上所述，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采取自上而下的方针，以贸易利益为诱饵，先让领主信教，然后扩大到一般领民。如大村、有马、天草等地出现领民集体入教的盛况。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大名们急需战略物资和增加财富。但当时国内贸易因连年战乱无法正常进行，对中国明的勘合贸易因倭寇扰乱而断绝，只有依靠南蛮贸易维持其经济，而接受天主教则是获得南蛮贸易的先决条件。战国大名为把葡萄牙商船吸引到自己的领地，对天主教表示热烈欢迎，率先受洗，带动领内百姓信教。当时即将统一日本的织田信长为了削弱佛教势力，采取保护天主教的政策，发给自由传教的许可证，助长了传播的速度。

第二，传教方式日本化。“外来宗教如果不能与当时的土地制度及习俗时尚相结合，就不能进入这块土地。”^①沙勿略来日本不久就写信给果阿的神父说，“我认为日本人是新发现的诸国中最高级的人种”^②不能强迫信教，让他们葡萄牙化，必须避免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冲突，传教方式尽量日本化。为此，耶稣会对日本文化和社会习俗进行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著作，作为传教的参考。还规定传教士到日本以前必须用一二年时间学习日语和日本的思想文化等知识。为了达到传教日本化的效果，大部分教堂是利用旧有佛寺，只是佛像换成圣母画像，佛堂佛具换成祭坛罢了。管理人也是由佛僧改宗的，连教堂名称也是沿用天门寺、大道寺等佛寺名称。当初传教士是把天主教作为佛教之一宗传给日本人的，传教用语也尽量借用佛教，以深入人心。为和日本人打成一片，传

① 山本新等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译本第12页。

② H·契斯利克《天主教书及其思想》，《日本思想大系》第25卷第551页。

教士穿和服，不食肉，尽量迎合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争取更多的人信教。

第三，广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耶稣会兴办各种慈善事业，如开办医院，设立孤儿院和育婴堂，成立义金赈济饥民等。特别医疗是传道事业中最重要的一环。初期传教士都是作为医生巡回各地，携带药品替日本人治病的。毛病一旦治好，就归于创造主的奇迹，许多人因此归依，有时全村信教，收到很大效果。

第四 顺应民心。当时佛教诸宗分裂 互相抗争 僧侣为获得现世利益而奔波 佛教远离一般民众所要求的“安生立命”“救济教化”等宗教宗旨。加之世道混乱，民不聊生，人们对佛教丧失信心。相反天主教教理简单，强调博爱平等，适应被压迫民众的心理，从而对天主教产生好感。这是天主教被日本人接受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五，耶稣会士的主观努力。耶稣会来日本传教的时候离教团成立只有十多年 充满朝气 会士坚守清贫、贞洁、服从 献身于传道事业。他们绝大部分是德操高尚、学问渊博的人 与墨守传统、贪图安逸的佛僧成鲜明对照。当时作为一个来日的传教士的条件，特别强调能忍耐寒暑、穷困、侮辱 志操坚贞 学问渊博 能够说服日本人。

第三节 西方文化传入的窗口

1. 长崎

葡萄牙人发现日本列岛之后，在南方的葡萄牙殖民地商人中间产生巨大反响。不久他们自己开船或搭乘中国便船来到日本，贩卖中国生丝 牟取巨利。

当初葡萄牙人的贸易专门由个人经营，1550年起国家垄断对日贸易。葡萄牙商船从印度果阿出发，经马六甲到澳门，把欧洲的利亚尔银币（西班牙小银币）、橄榄油、葡萄酒和东南亚的香料换成

中国生丝及金、丝织品等 再由澳门乘南方季节风于六七月间抵达日本的港口。在日本将商品换成日本银之后 就乘晚秋初冬的北风启航回澳门 用日本银采购中国生丝和丝织品 立即返回印度。

然而对日贸易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往往与耶稣会的传教紧密结合 所以情况复杂起来。在不欢迎传教的大名岛津氏和松浦氏的领内贸易碰壁，在天主教大名大村纯忠的领内，即使横濑浦开港，不久也被烧毁 使葡萄牙人大为焦虑。因此葡萄牙人一时不得已又想进入平户 但领主松浦隆信仍无好意。经传教士建议 葡萄牙船在长崎港外西北岸的福田浦停靠 但福田浦太靠近外洋 停泊船不一定安全。经过调查测量 发现离福田浦不远的海岸有一朝东北的入口 向内湾入 湾内水深 三面高山环抱 地形很像里斯本 为一天然良港——长崎。他们立即与领主大村纯忠交涉 获准使用该港。1571年（元龟二年）葡萄牙船和中国船开始入港。其后长崎便繁荣起来，长期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口岸和西方文化传入的窗口。

1579年（天正七年）耶稣会巡察师范礼安来到有马镇贵（晴信）的领地口之津 视察日本教会。当时恰巧以佐贺城为根据地的龙造寺隆信的大军压城 有马镇贵甚为不安。为消除信教后国亡家破的谣言，范礼安决定全力援助镇贵，到口之津亲自为镇贵授洗礼 并提供粮食弹药。龙造寺军鉴于有马城防御坚固 最后不得不讲和。镇贵为向神表示感谢 将长崎东北的浦上献给耶稣会。另一方面，大村纯忠及其子喜前害怕长崎繁荣起来会遭到龙造寺和岛津等大名的嫉妒而来攻打，便将长崎及其南面的茂木献给耶稣会。这样 浦上、茂木、长崎三地的土地及行政司法权完全让给耶稣会，日本人只征收贸易税。不久在外浦町建造宏伟的圣马利亚天主堂，作为耶稣会的本部 长崎成为西日本的传教和贸易中心。黑船 葡萄牙船 和天主堂、甲比丹 船长、商馆长 和伴天连 传教士 象征着当时长崎的风情 西方文化 南蛮文化 通过长崎这个窗口涌进日本。

2. 京都

长崎开港及耶稣会本部的建立，使随着天主教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从这里向整个西日本扩散。而东日本也因天主教保护人织田信长登上历史舞台而使西方文化找到了着陆的地方。东西相呼应，创造了西方文化在日本安家落户的机遇。

沙勿略来京都传教失败后的第八年，即1559年（永禄二年）9月，维列拉继承沙勿略的遗志，剃去胡子与头发，穿上粗布黑衣，僧侣打扮，率领二名日本人进京开教。他来日已有三年半时间，在府内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最初在下京革的棚口租借一间小屋，屋上竖起十字架开始传教。京都屡遭战乱，人心不安定，起初来听道的人很少，后来由于他热心说教，听众渐渐多起来，不少佛僧也来听道。佛僧听了便谩骂，还造谣说维列拉是披着人皮的魔鬼，吃人肉，屋里死人骨头堆积如山，结果被房东赶走。先迁到六角玉藏町，后又移到四条乌丸等地，终于在四条坊门的姥柳町买下佛寺充当教堂，总算安顿下来。

维列拉设法谒见将军义辉及三好长庆、松永久秀等大官，取得了和社寺同样的特权（免除诸课役及禁止粗暴人入内等），公开受到保护。维列拉便以京都为根据地，向附近的奈良、十字、饭盛、若江等地发展。弗洛伊斯又从丰后来协助，传教事业顺利开展。但因佛僧强烈反对，不得不暂时离开京都，以堺和奈良为中心向河内、和泉及大和地方传道，其间获得泽城主高山父子等有实力的信徒。不久将军义辉被杀，三好、松永叛变，京都混乱，传教士也被迫离京。1568年（永禄十一年）10月，信长入京，拥立将军义昭，在他保护下，传教事业逐渐恢复。

1569年（永禄十二年）4月8日，信长发给教会盖着“天下布武”朱印的许可证。其中规定免除课役，准许在领内自由活动，不得加以妨碍。如有不法之徒干扰，要坚决处分。将军义昭也下了同样内容的布告。同月15日，由信长和义昭斡旋，正亲天皇以诏书下达

批准天主教传教的命令。教会终于达到了 20 年前沙勿略梦寐以求的公开传教愿望。

1575 年维利拉着手改建四条坊门的旧教堂。翌年春三层楼的新教堂落成 8 月 15 日沙勿略来日开教纪念日将它命名为“升天圣母堂”世称南蛮寺。狩野元秀曾画《京都南蛮寺》一幅 现藏神户市立美术馆。

第四节 西方文化传入的渠道

1. 葡萄牙船

哥伦布 1492 年发现美洲以前，一直在寻找马可波罗介绍给欧洲的黄金宝库日本。他到达西印度群岛一角时，以为这就是亚洲大陆的东端，而其中一岛就是日本。从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的 1520 年，到菲律宾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政府四次派遣探险队均未发现的日本，却被葡萄牙捷足先登了。

葡萄牙一占领马尼拉就把贸易之手伸向中国。1513 年葡萄牙船到了中国南部，30 年代北上到了宁波附近的岛屿，以此为根据地和与中国贸易。1543 年三名葡萄牙人所乘中国帆船漂到种子岛就是以宁波为贸易基地的时期。不久葡萄牙人南下，1553 年占领澳门。在此稍前，每年有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萨摩、大隅、丰后、日向、平户等港，其中入平户港的次数最多。

开往日本的葡萄牙船最初是中国式帆船（junk）后来是被称为“黑船”（nao）的数百吨大船。每年一只，有时还增加一二艘中国式帆船和“伽利安船”（galeão）。前述耶稣会传教士是搭乘葡萄牙船来日的。因为商人对日本情况不了解，必须按照熟悉日本情况的传教士的指示进行贸易。传教士则以贸易为诱饵让当地领主信教，然后带动领民集体信教，造成贸易与传教不可分割的状态。随着天主教的传入，天主教文化涌进日本，它包括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美术

音乐、建筑雕刻、风俗习惯。虽然日本对天主教文化的接受含有功利主义的目的，但还是很天真地接受了。天主教文化不单是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它还包括所有欧洲文化，所以说天主教传入的载体是葡萄牙船，而欧洲文化的载体是天主教。从而葡萄牙船是欧洲文化传入日本的主要渠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阪南蛮文化馆和神户市立博物馆所藏的南蛮屏风《南蛮人渡来图》中得到形象而具体的证明。

2. 西班牙船

如前章所述，当西班牙人在梦想发现黄金宝库——日本列岛时，葡萄牙人已捷足先登发现了日本。

1584年（天正十二年）一艘西班牙船在从马尼拉到澳门途中迷失方向，在中国沿岸遇到一艘葡萄牙船，在它带领下驶往平户，受到平户领主松浦法印的欢迎。当时船上还乘着四名西班牙的方济各会士，法印不仅希望西班牙派传教士来，还写信给菲律宾总督，请他每年开船来贸易。其后法印派商船到马尼拉，西班牙船也来平户贸易。松浦法印这样欢迎西班牙商船是因为他对耶稣会的态度不好，葡萄牙传教士对他不满，从而葡萄牙商船不来平户，却到肥前的长崎。

1587年（天正十五年）丰臣秀吉发布传教士驱逐令（后述），耶稣会生怕激怒秀吉，表面上停止传教活动。此时西班牙系统的方济各会乘机展开传教活动，几乎占据了过去耶稣会的地盘。

当时日本商船每年去马尼拉，带去的主要是银，其次是小麦、鱼等食品，工艺品也不少。带回的主要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其次是鹿皮等。

至17世纪，日本和西班牙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德川家康为振兴对外贸易，将西班牙船招到关东江户入口处的浦贺，被选为贸易港。随着贸易的兴隆，天主教开始抬头，西方文化跟着传入日本。特别家康利用传教士为外交政策服务，取得很大成效。1600年（庆

长五年)家康登用潜伏日本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吉罗尼摩·特·吉士斯(Jeronimo de Jesus, ?—1602),让他作使节去菲律宾打开日西贸易关系。家康的希望不仅是通商,还要求派遣领航员、造船技师及开采银矿的矿山技师。其代价是准许方济各会在日本传教,并在江户建立教堂和慈善医院等。

1609年(庆长十四年)9月,前菲律宾总督威拉斯哥·维威罗(Velasco Vivero)回墨西哥途中,乘船“圣方济各号”在上总海面遇难,50多人溺死,他漂到千叶县夷隅郡浪花村岩和田的田尻海岸,被渔民搭救。后去江户谒见将军秀忠,又在骏府会见家康。家康抓住机会,希望开辟和新西班牙(即后来的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航线,并从墨西哥招聘矿山技师和矿工。家康还给维威罗从浦贺回墨西哥通行无阻的朱印状,让他乘三浦按针所造的船回国。

1612年(庆长十七年)西班牙特使塞巴斯丁·维兹凯诺(Sebastian Vizcaino, 1551—1615)带着西班牙政府给幕府的感谢信来到日本,并得到幕府许可,在从奥州到长崎的太平洋沿岸探险(后因船只破损未能实现)。维兹凯诺与支仓常长(后述)同船回墨西哥。

日本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因幕府禁教而受到阻碍。1616年(元和二年)家康死后,对天主教迫害更加厉害起来。此时往来于马尼拉和长崎之间的商船往往被企图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利用。马尼拉政厅恐怕会招致停止贸易,曾严加取缔,但不能阻止传教士的宗教热情。1620年8月发生平山常陈事件(后述),幕府被新教国(荷、英)策划的阴谋煽动,终于停止了对马尼拉的贸易。其后与菲律宾的通商关系也断绝了,西方文化通过西班牙船流入日本的渠道被堵塞。

3. 荷兰船与英国船

16世纪末欧洲形势发生巨变,1581年(天正九年)新教徒占多数的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稍后,1588年(天正